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江苏社科院名、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于2023年1月2日在南京去世,享年87岁。缅怀的同时,不禁追忆十余年前与胡教授的一次联系。

一日在城里旧书店闲逛,看到一摞旧报纸,其中有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的《光明日报》,我想能找到几张有纪念意义的报纸就好了。翻着翻着,还真找到了,1978年5月11日的,头版载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还有一张1984年10月11日的,头版有《鼓励理论工作者研究各种现实问题》本报举行优秀论文作者授奖大会》并获《实践的优理论文章篇目及作者名单》,报道中说:10月10日,本报在北京举行优秀理论文章作者授奖大会,胡福明、王蒙等三十几位同志的27篇文章被评为优秀理论文章,大会向获奖文章在京作者发了证书和奖金。获奖文章设特别奖一篇,即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署名“胡福明”。名单后有一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时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看到这两份报纸,我心中窃喜,花费几块钱买了下来。得报后甚觉幸运,就想给胡福明教授写信,请他分享这份来自一位读者的喜悦。2010年7月11日寄出,8月1日教授即挂号回了邮件,包括一封信、一本书。信中写道:

寄来的信和资料,我均早已收到,忙于杂务,迟复为歉。寄上一本书,上面已有我签名,请批评指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平凡的真理,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提出的,仅此而已。

敬礼!

胡福明  
二〇一〇.八.一

书为《思想的力量——哲学家胡福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胡福明教授题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共勉 胡福明 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编者前言”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胡先生的理论研究分别经历了“实践标准与思想解放”“乡镇企业与苏南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等几个阶段的发展。由于在“实践标准”问题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非常高的理论起点,胡先生在其他几个研究领域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理论成果……除了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很高造诣,以及对当代中国思想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外,胡福明教授在日常生活上也具有很强的性格魅力。他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人,很多曾与他交往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胡教授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即使是后来他身居高位的时候,也从不摆架子。胡教授以前的那些同事一直都亲切地称呼他“老胡”。他是一位真正的“平民思想家”和“布衣官员”。这与当今学界一些稍有名气和地位便显得孤芳自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1977年7月,因妻子住院,胡福明到院陪护,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草拟文字提纲,查找资料,初定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月初,他将此八千字左右的文章寄给《光明日报》。1978年1月10日,光明日报社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份大样,他开始修改;同年4月下旬,在北京开会的胡福明被接到光明日报社,与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一起讨论该文章,杨、马、孙对文章进行了修改,5月11日刊登时,标题添加了“唯一”两字,是以上三位同志改稿时所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胡福明获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代表人物;2019年9月25日,胡福明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0年10月18日获南京大学哲学系“最高贡献奖”、“真国士也,一纸清明留风骨。其先生乎!十分贵重是精神”——胡福明教授去世后,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特书这样一副敬书挽联。

还有值得记的一件事。2014年是《光明日报》创刊65周年,报社开展了主题为“六十五载相伴,与光明一路同行”的“我与光明情缘”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与〈光明日报〉二三事》,其中一正是就载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与胡福明教授联系的往事,该文有幸获奖,报社给我颁发了获奖证书。

两份报纸,一封信,一本书,感恩胡福明教授的馈赠,这些将成寒斋的珍藏。

# 满庭芳

第五七一期

## 遍地英雄

阎晓明



1966年秋,我同160名天津青年坐三天火车抵达酒泉,再乘卡车一路向北到了古长城下的连队驻地。营房与待开垦的处女地处于长城内碱漠,长城外向北则全是一望无际的黑色戈壁。我常常会在收工后穿越城壕豁口独步戈壁。谁知,就在这人迹罕至的空间,渐渐结识的“故事人物”却如遍地铺满的戈壁石般多了起来……

每天带我们出工的张排长,是个老实巴交的河南籍退伍兵,某日上工途中却一反常态地教我们匍匐前进,做起“前三角”“后三角”阵形的进攻训练。有操天津话的埋怨:“累得浑身酸了架,还练这干嘛?”他理亏似的低了头,却嗔嗔着反问:你敢把“屯垦戍边”改成“只垦不戍”?这就是张排,任你号称“卫嘴子”的再怎么咋呼,他自有普通一兵的战士底线。他是刚从对印自卫反击战部队复员的,全团有很多他的战友和老乡,譬如我调团后结识的保卫股王干事、组织股郭干事、子弟小学张副校长,都是上过前线打过仗的。

我们副连长姓赵,个子矮矮,头大腿短且罗圈儿。来自大城市的不但瞧不上他的长相,还嫌弃他的口音,平时对他爱搭不理。他非但不计较,还一直对我们热情不减,更透出了几分窝囊。可是,新年联欢会上,他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唱了一首歌,就不由得我对他刮目相看了。那天,他用白毛巾裹住那颗硕大的头,装扮成冀中妇女,可笑的是在白毛巾的映衬下,面庞显得越发黧黑:“你走你的山梁,我走我的沟。咱二人定计啊,摆摆那个手。”因从未听过,倍觉悦耳,他反反复复唱了三遍,我被震撼得鼻腔竟有些酸了。从此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特别服他,并非仅为歌的缘故,而是听他说他的罗圈腿是骑马骑的,退伍前他在甘南草原当骑兵,还参加过与土匪

作战的平叛战斗。我恰恰偏爱和信服那些经历过真枪林实弹雨的人。

另一副连长黄焕光虽未打过仗,却也是我乃至全国电影观众心目中的英雄。他是演员,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战友》和《打击侵略者》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从八一厂下放到我们连。《打击侵略者》中他饰演的角色牺牲前那大段独白真可谓感动天地,我后来当电影放映员时都能背诵下来。

放映是1971年团政治处宣传股当新闻干事后的兼职。在团部我又认识了真正在抗美援朝前线打过仗的司令部生产股王参谋,问他是干什么兵,他操着东北话说:“狙击手,专打冷枪。还常到公路上撒三角钉,扎敌军车胎。那种钉子特好使,三面皆钉,总有一面朝上。”

我们的王副团长是胶东人,曾在解放战争后期南下上海。“趴在火车顶子上过去的。那是冬天。住人家大客厅,提前教了我们——开灯要扳墙上的开关。我夜间去厕所,明明扳了开关,灯却没亮。摸黑回来再睡,越睡越冷。天亮以后才看见房顶有个圆家伙插了几支‘船桨’在转,冷风就是这么转出来的。敢情我扳的是吊扇开关!”他嘿嘿笑着,“第一次见香蕉也是在上海,不知剥皮,连皮吃的。”

1974年调入师政治部宣传科后,听副师长讲过参加长征的红军故事,也听彭参谋长讲过在延安的抗战故事。一位在新疆经历野战部队改制建设兵团的老兵,讲过烈日下脱光衣服抡砍土馒的拓荒情景。还有一位总跟我攀天津老乡的葛协理员讲过参加渡江战役的经历,我特别羡慕:“在船上看见千帆竞发的壮观场面啦?”“看见?上了船就得低着头,光听子弹在脑瓜顶上嗖嗖地飞!”他操着静海口音,“能活着上岸冲到前线去打,就算英雄好汉!”

其实,不逊退伍官兵故事的还有很多:上世纪40年代的“起义兵”“解放兵”,以及参加河西走廊“屯垦实验管理局”拓荒的伤残军人和各地青年;50年代的上海移民,来自甘肃各地的农场老职工和早期的天津支边青年;60年代的大学毕业支边医生,足够多的正式建立了农建一师京剧团的科班演员,来自北京、天津、西安、兰州、青岛、淄博、济宁、枣庄的知青……五湖四海,经历迥异,无奇不有,各有绝活。

1976年年底,接到甘肃省委宣传部的调令后,我特意返回长城脚下的老连队拍照留念。当时,百余名天津战友大都已通过上学、招工、“病退”返城离开了,剩余人员集中

到团部进行啤酒花的种植加工,所谓老连队已空无一人。我又攀向那段几乎为人遗忘的长城。连绵的土墙筑在起伏不平的土岗子上,断断续续的,有的地方已被风沙剥蚀得露出了黄褐色的芨芨草绳。城墙外依然是我熟悉的黑戈壁和一蓬蓬的骆驼刺,不同的是,骆驼刺周围却多了些悠然觅食的骆驼。正在诧异骆驼从何而来,却听到一声熟悉的乡音:“不是野的,有主儿!”寻声攀上土墩状的烽火台,见到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天津人。他的确不是我们团的,而是在石棉矿实施爆破被炸伤后调到我们团畜牧连的。问他为何不办“病退”回天津,他却反问:“回去给家人添堵?给街道找麻烦?在这儿,别看瘸了一条腿,照放骆驼不误!”可能见我浸出了泪,便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戈壁石,乐呵呵地塞给我:“留着玩儿!”“石子儿?”我担心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珊瑚!珊瑚的化石!”他提起一颗青色的戈壁石,指着上边星星似的圆点,“这就是珊瑚枝的横断面。咱脚下的戈壁,亿万年前那就是海!别看石子儿小,人家可没见过雪山是怎么从海里起来的呢!”

夕阳就要沉到雪山背后去了,我不得不告别骆驼,走下烽火台。伴着步履,戈壁石在口袋中仿佛注入了生命,鲜活地跳着,发出动听的撞击声,仿佛在提醒着我,正是由它们凝结而成的浩瀚戈壁,支撑着气势磅礴的长城和气象非凡的雪山。是啊,有着它们的凝聚与支撑,雪山可放心挺直脊梁,去尽自己的巍峨壮美;长城可安享静好岁月,去延展自己的辉煌历史;我们每一个行走于大地的人,也可愉悦畅怀地边走边唱、一路高歌了。取出戈壁石,小东西们在我的掌心竟然活了一般。凝望着它们,我才恍然想到,自己竟未曾问起那牧驼者的名姓……

## 难忘的女兵采伐队

石磅

1969年,国家计划在乌兰浩特建立一所野战医院,建设营房、病房都需要木材,因此在大兴安岭林区批下了采伐量,可是林业工人忙不过来。1971年,医院正式开始营建,建院任务不能等,医院党委决定自己组成采伐队上山伐木,按说这应该是男兵的任务,可是这个团男兵数量太少,于是组成了一支女兵采伐队,于这年冬季开赴大兴安岭深处的深山老林。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马呀一呀一杆枪,獐狗野鹿漫山遍野打也打不尽……”唱着这支鄂伦春歌曲进山的小女兵,全是当年刚入伍的十六七岁的新兵。她们乘坐军用卡车奔驰几百公里,从乌兰浩特到达公路都没有的布特哈旗大兴安岭深处,安营扎寨搭起帐篷,砌好火炉,第二天就扛起开山斧、大肚子锯,踏着没膝盖的积雪进山伐木了。

说起伐木工,我这个男兵心里都打怵。1958年的某天,我因为手受伤到省人民医院去换药,忽然走廊里抬进一副用木杠麻绳做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名浑身打哆嗦的伤员,掀开脏被子之后一股浓重的臭气弥漫整条走廊,我上前一看,伤者是一名长白山的采伐工人,他的伤腿长出了寸把长的青毛,是被伐倒的树木砸成了粉碎性骨折,工友们从山上往下抬,坐牛车、乘马车、赶汽车、上火车……七天才到了省立医院,伤者一直在发高烧,是败血症。医生说腿保不住了,命能保住就是万幸。

踏上采访女兵采伐队的路途,我脑海里一直闪现着那名采伐工人受伤的画面。到了现场,发现野战医院的领导对安全工作抓得不错:采伐现场设置了安全员,两人一组伐一棵树,各个小组都拉开了安全的采伐距离。先在下坡的那面树根部用大肚子锯拉两道口子,用开山斧砍去中间的木片,此时安全员吹响紧急撤离的哨声,高喊一声:“顺山倒锯!”再用开山斧一敲树干,大树就顺着山坡的方向缓缓倒下……

这些女小兵从早到晚跪在雪地上,两人一组从事着这种粗放的重体力劳动。每天收工之后,她们都要在帐篷里烘烤湿透的棉裤和大头鞋,第二天好再穿上。住在家里大米饭、白馒头也吃不下二两的这些女孩,如今不仅自己生火做高粱米饭、玉米面粥,还会熬馒头了。四两个一个大馒头,她们一顿要吃吃!原木攒到一定数量时,她们就把拴着钢丝绳的道钉砸进原木里,另一头套上轱辘,把原木从山上拉到山下,再用汽车运往乌兰浩特大板厂。

经过冬春两季的艰苦劳作,这些女伐木工个个红脸堂堂、身强体壮,又立即投身到了野战医院的建设当中。采访归来,我把她们的事迹写成五幕话剧《青春的火花》,又写成散文《女子采伐队》,刊登在1973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沈阳军区歌舞团把它改编成了舞剧。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女兵们都已成了银发一族的奶奶、姥姥,我坚信这一段特殊的采伐经历她们会终生难忘。

## 津海华洋说家具(七)

### 海派家具里的“中国”

姜维群

海派家具之所以能成为家具里的一个“派”,是因为它在中国古典家具基础上,结合欧式家具进行了大改良。其在雕刻的花饰方面,大量采用了欧式建筑、欧式家具的花饰,是一增;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里有大量的吉祥花饰图案,民国海派家具没有摒弃,而是巧妙地进行了融合。

往远处扯一扯,家具的初始阶段是朴素的,完全是实用功能。凳子就是坐的,床是用来躺的,柜子当然是放东西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视觉要求出现了,装饰美化功用需要满足眼睛的美感,而中国人自古以来有敬畏之心,于是增加雕刻花饰来满足祈福纳祥的心理需求。

海派家具吸纳了大量的西洋花饰,但古有的吉祥符号仍然跻身其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定型,形成了海派家具的一道风景线,譬



洁上丛话

2013年,华裔导演林诣彬执导的《速度与激情6》上映,从第三部到第六部,他成为执导该系列作品最多的导演,且每一部都刷新了新的票房纪录。在第六部之后,林诣彬退出了“速度与激情”系列,该系列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第七部和第八部中,上演各种“不可能”的追车场面。本周推介的影片是2021年上映的《速度与激情9》,会将这些追车场面再度升级,这一部也是林诣彬告别该系列7年后的回归之作。

2006年,林诣彬从《速度与激情3》开始,与该系列正式结缘,首次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东京,上演漂移名场面。2009年,他执导的《速度与激情4》,是该系列全球票房首次突破3亿美元的翻身之作,开篇就上演了追逐油罐车的名场面。随后的第五部、第六部,更是为观众带来了跑车拉着保险箱飙车、与坦克飙车等影史追车名场面。

回归“速度与激情”系列,林诣彬将仅靠一根钢索,让汽车飞跃大峡谷。要想完成如此“不可能”的追车场面,除了导演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当然还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他就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主演范·迪塞尔。2007年,他从《速度与激情4》开始担任该系列的制片人,当时也正值林诣彬对这个系列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要开始转型成为以大场面为主的动作电影,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始构思各种“不可能”的追车场面,而为了让影片中的追车戏份儿有一个更加合理的初衷,范·迪塞尔还在《速度与激情5》中,正式提出了家人的概念。从

## 《速度与激情9》:

### 追逐“不可能”的动作场面

郝赫

这部开始,范·迪塞尔几乎在每一部里都要反复提到家人一词,因此影迷们还调侃地称他为“家人侠”。

在林诣彬和范·迪塞尔的坚持下,“速度与激情”系列里那些“不可能”的追车场面,还一直坚持用真车实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整个系列在拍摄中已经砸坏了约2500辆汽车。在《速度与激情9》里,有一场重头戏就损毁了50余辆车!让我们一起走进《速度与激情9》,感受生死契阔的速度与激情。

8月5日22:22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速度与激情9》,8月6日14:36“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洁上丛话

坐落在河北区吕纬路93号的天津市扶轮中学,是一所具有一百多年办学历史,积淀了丰硕教育业绩的知名学校,且仍在沿用建校伊始时建造的独特建筑石楼,见证学校办学历程,彰显百年教育春秋。



## 铁路名校扶轮中学

魏暑临

扶轮中学于1918年10月11日成立,同年11月4日正式开学,这是国内第一所铁路中学。1918年2月,京汉、京奉、京绥、津浦铁路职工联合发起组织“铁路同仁教育会”,会长由时任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担任,副会长由时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关庚麟担任,董事由时任交通部次长徐世昌、总工程师詹天佑等12人担任。为切实解决铁路职工子弟的上学问题,“教育会”以“扶轮公学”为统一校名,在“四路”沿线筹建员工子弟学校,天津扶轮中学作为其中之一,其最初的全称为“天津扶轮公学第一小学”。

为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其外檐均用青石条砌筑,地基深稳,墙厚度达60厘米,抗震强度很高,是天津少有的、著名的石头楼之一。两座石楼于2013年被天津市政府认定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扶轮中学自成立之日起,与时辗转,几经变革,仅校名就经多次更改。1922年5月,该校归当时的交通部管辖,遂更名为“交通部扶轮第一中学校”;交通部立天津扶轮中学校。1929年,改属当时的铁道部直接管辖,更名为“铁道部立天津扶轮中学”。因1937年被日本侵略者强占为陆军医院,无法办学,遂于1940年在湖南冷水滩筹备复课,后在沿湘桂、黔桂铁路撤退途中继续办学。1946年在天津原址恢复为“交通部立天津扶轮中学”,面向交通部所属的路、电、邮、航等系统员工子弟招生。1950年改称“天津铁路职工子弟中学”,面向天津铁路管理局内铁路职工子弟招生,“扶轮”之名一度废弃。1963年改称“天津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2005年9月

品质的优异和提升提供了保障。顾宝琦、杨绍萱、董秋芳、赵友琴、李照春、赵子健、刘瑞章等一批知名教师,都曾在校从事一线教学工作,郁达夫等很多社会知名人士曾到该校演讲,对在校学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一批批时代英才从该校走出,涌现于社会。

知名校友、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扶轮情结格外浓郁。陈省身于1922年随父母来到天津,次年插班进入扶轮中学。(在班,他年纪虽小,却全面发展,成绩突出,还经常在《扶轮》校刊上发表解题方法和诗歌。因当时该校实行四年制,陈省身于1926年正式毕业,考入南开大学。自1980年8月20日起,阔别扶轮近60年的陈省身先后7次回母校,在1996年6月的一次题词中表达对扶轮的感激与热爱之情:“我的数学事业是从扶轮开始的。”从1988年开始,陈省身出资在扶轮中学设立了“陈省身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2000年,扶轮中学为陈省身铸立一尊半身铜像,他本人参加了铜像的落成仪式。从此,陈省身这位优秀且始终心系扶轮的校友,更加紧密地与他曾经求学、生活的母校联系在一起。

扶轮中学的石楼以历史悠久、载育人才而闻名,设置在南楼中的校史陈列馆也因突出的红色革命教育内容而享誉学界,先后被铁道部、天

津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扶轮校史馆结合学校办学历史,彰显学校革命传统,弘扬“成才报国”的扶轮精神,记录了扶轮各个时期为国家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献出宝贵生命的校友事迹。从中可见扶轮师生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等革命运动。1936年6月,该校学生中诞生了中共党支部,有党员15人,是当时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大专学校中最大的党组织,而石楼的地下室就是当年革命学生主要的活动场所。在扶轮的红色历史上,曾涌现出很多杰出的英雄楷模,其中包括天津早期共产党员、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天津中山公园“十五烈士纪念碑”中表彰的革命烈士江震寰,支援五卅运动的刘世华等扶轮师生,“九一八”事变后代表天津学生在南京当面向蒋介石请愿的李又辰,等等。这些过往的扶轮人事,与饱经沧桑、色调深沉的扶轮石头楼一起,永远绽放着扶轮中学红色的教育光芒。(题图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该校建筑由“建筑泰斗”庄俊设计,他也是上海金城银行、上海中南银行、汉口金城银行、青岛交通银行和清华大学内部分建筑的设计者。经招标,学校建筑由天津振元木厂承建,1919年正式开工。建成石楼房两座,南楼为教学楼,北楼为学生宿舍,另配有礼堂、阶梯教室、物理化学实验室、音乐教室、手工作业室、餐厅、盥洗室等。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是石砌的南楼、北楼。南楼建于1922年,为一字型,二层平层;北楼建于1920年,为L字型,砖木结构,三层。两楼均有地下室,都采用平面对称布局,体量适宜伸展,花饰女儿墙,

改称“天津市扶轮中学”,重启“扶轮”之名。该校现在使用的校徽,其构图中央仍用当年叶恭绰所书“扶轮”二字,以表示对学校创建与历史沿革的追思与珍重。

“扶轮”一词本就非常古雅,汉魏诗歌辞赋中多见之,本有“扶翼车轮”之意,而旧时常引申为所谓“大雅扶轮”,用以赞美德望之人,或表示对崇高理想的向往。扶轮中学的命名,据说参考了“灵辄扶轮”(出自《左传·宣公二年》)、“扶轮报毅”(出自《史记·荆轲世家》)的典故,分别体现知恩图报、助人立业之意,以启迪扶轮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励志笃行,求学报国。铁路学校以“扶轮”命名,产业特色与育人寓意可谓兼而得之,十分恰切生动,也为“扶轮”这一词汇赋予了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意义的教育内涵。

该校建校伊始,即以“忠、信、仁、勇”为校训,明确“各科教授之方法”是“纯取自动主义”,注重“道德之培养”和“校风建设”。在这样的办学理念引领下,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执教扶轮,为教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胡福明获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代表人物;2019年9月25日,胡福明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0年10月18日获南京大学哲学系“最高贡献奖”、“真国士也,一纸清明留风骨。其先生乎!十分贵重是精神”——胡福明教授去世后,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特书这样一副敬书挽联。

还有值得记的一件事。2014年是《光明日报》创刊65周年,报社开展了主题为“六十五载相伴,与光明一路同行”的“我与光明情缘”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与〈光明日报〉二三事》,其中一正是就载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与胡福明教授联系的往事,该文有幸获奖,报社给我颁发了获奖证书。

两份报纸,一封信,一本书,感恩胡福明教授的馈赠,这些将成寒斋的珍藏。

●《小楼春秋》解说词:  
叶恭绰先生的墨宝“扶轮”二字完好地珍藏于石楼里。当年,这位崇尚教育救国的校董,对扶轮中学寄予厚望。他在首届开学典礼上发表致辞,并将当时的校训定为“忠信仁勇”。扶轮人也的确不负所望,在五卅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等各个关键历史时期,写下了反帝爱国斗争的光荣篇章。(节选)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